

绪 论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中国和泰国在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两国关系之密切，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这种影响在文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分不清哪个文化是中国的，哪个文化是泰国的。两国社会进入近代史阶段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萌生了启蒙主义思潮。到了 1919 年中国的“5.4 运动”和泰国的“6.24 运动”前后，两国的启蒙主义思潮出现了高潮。在这样一个历史变化中，两国小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它的地位和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几百年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学影响，其时间界极大多在现代文学阶段以前，而且研究方法较多偏向于影响研究。但是，除了影响研究的方法以外，能不能还可以通过平行研究的方法探讨两国间现在的文学现象，从中有所领悟呢？因此，对中泰文坛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两国新文学界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的比较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将对中泰现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作家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创作特色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他们的文学共性和差异。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是两位在国内外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思想和独特风格的重要作家，引起了当时大众的的强烈反应，赢得了广大的欢迎和称赞。笔者在读其作品后，发现两位作家的创作这方面大致相似，为何发生这种现象呢？笔者为此寻找答案，终于发现某个国家的作家受到某其他国家的小说创作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可能的。中泰两国是姐妹国家，所以中泰作家有相似的小说创作也是可能的。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虽生于不同国家，但我们却能从他们作品中找到他们小说的共同创作特征，这是什么原因？笔者认为“任何艺术是离不开社会环境和时代而发生的”。即：“读文学，也是读历史的”。因此通过他们的小说，我们能看到当时他们的生活经历，社会，文化背景。目前中泰文学比较研究相当欠缺这个现状，笔者认为能展开这一选题是有意义的，有必要的。本文以他们的小说创作特色：苦难人生，爱情苦闷，零余者这几个关键字为主线，以研究他们

的小说创作的异同为主要方向，把他们小说研究的资料串起来，从而形成这篇文章。在泰国文坛上，泰国文学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名为现实主义派。创始人是孟昭·阿卡丹庚亲王（生于1905年），孟昭·阿卡丹庚在泰国文学中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人生戏剧》1928年发表。小说里面的故事是采取日记形式，是以国外为背景而生。他用第一人称来描写了“我”——维属，缺乏爱抚的童年，父母对子女的偏爱，使主人公产生的自卑心理和对弱者的同情，自幼对于赌博的嗜好和朦胧的初恋的爱情。小说的国外生活部分是主体，作者像讲故事一样朴素地道出了一个留学生的经历。他的苦恼和欢乐，一个身处于西方社会的东方青年的感受和见闻。再说，作者通过“我”说明生活，幸福、痛苦是无常的，难以预测，人生就像一出戏剧。

他的小说像旅游日记一样真实，小说大部分都是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把孟昭·阿卡丹庚的小说连起来读，基本上同他生活轨迹相合。这样新奇的情节，给当时读者和其他作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影响到后来作家的写法。

他的小说人物更离不开作者本人，是根据作者本人的思想：幼时没有得到父母的温爱，这种幼枝的悲哀，建设了他的自卑性、忧郁性、怨恨性等等。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塑造出的某种人物，那种自艾自怜，充满寂寞、孤独、矛盾、脆弱、悲伤的字句，因此他才会写出充满个性的苦闷和反对传统礼法的小说。最后塑造了一个充满了“零余者”形象。孟昭·阿卡丹庚说：“我是在泰国学校毕业的，将来自己能会做什么呢？怎么可能比得上从外国学校毕业的呢？一个月的薪水活的了么？学校啊！我们学校！真悲惨！”^[1]。

从他小说中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存在的富国强兵的理想，这透露到他小说中的革命思想，不过是对泰国的某些陈规陋习的攻击和青年人命运的关心上。不仅如此，孟昭·阿卡丹庚小说能把当时泰国上层的贵族社会公开地暴露出来，大胆地作出向来没有人敢做的。解开泰国上层的贵族的暗藏，让普通人民认识他们的生活状态。虽然他出生于上层贵族的亲王，但他活得像普通人一样，没有任何差别，他一直认为自己也是一个穷亲王，他的身份没有当饭吃。

^[1]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60 页

他的爱情苦闷的表现也是他的一个重要主题，他所有小说都是存在作者的“苦闷爱情”表现。《人生喜剧》的“我”：反对当时泰国社会的传统男女“性”的不平等问题，对于丈夫可以有很多妻子，向当时泰国社会的“性道德”提出大胆挑战。这也是作者本身和他母亲的真实遭遇。因此孟昭·阿卡丹庚的觉醒能使当时的泰国人对于“一夫一妻”的反省。

孟昭·阿卡丹庚的第二部小说《黄种人白种人》是注重于人与人之间的种族歧视问题。人的“善”和“恶”不是在于人的出生点，人的皮肤，产生不平等的问题。作者认为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良好的环境，良好的培养，即使皮肤的颜色不同，人与人之间也会平等的，尤其是在爱情方面。

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发表后，社会的反响很大。大多数人以为小说中的主角就是作者自己，继而又问其他角色是否真有其人？而亲戚甚至认为作者诋毁了自己的父亲。产生这场风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社会对艺术真实的不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作者在艺术上的成功，因为在泰国早期小说创作上“假”几乎是一种通病的情况下，这可以说是他创作上一个突出成就。

二、有关研究课题的状况和要解决的问题

至今，纵观孟昭·阿卡丹庚研究，笔者发现虽然孟昭·阿卡丹庚名誉在泰国文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人们还是比较少认识他，甚至知道他的小说的人更少，是因为一是他人的生命短，二是他留下的小说不多，因此研究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几乎很少。虽然有，但只是评论他的小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文风大胆，坦率和真实的重要作家。在那个年代他的前卫风格的确是独树一帜，注重于内在的剖析和表现自我，用字暴露濒于当时的社会传统好道德，作品内容太过颓废有败坏人心之处。但正因他不刻意掩饰，所以他所写的才是一个有情的真实世界。另外，在他的小说中充满着主观抒情的色彩，因为他常常将自己的情感习惯融入到他的写作中。

郁达夫的第一篇小说集《沉沦》发表后，在旧中国那枯槁的社会里，那青年的苦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郁达夫也是因此而斐声文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此后，在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郁达夫又写了 50 多篇短中篇小说。其中不

少篇章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笔者认为要关注到他的开创“身边小说”小说新模式。郁达夫开创的“身边小说”或者“自叙传”小说新模式都是对中国新文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点早已被学术界所公认。郁达夫创作的 50 余篇小说中属于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就有 40 余篇。身边小说大多选取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角度，有利于抒发主观情感和表现自我，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因此郁达夫用这样的创作特色，向读者说出他自己的人生感受，痛苦悲伤的过程，赤裸裸的心灵袒露缩短了与读者的距离。

郁达夫的另一种十分重要的，那就是性的表现。男女关系的不得已而激发起内心的不可名状的苦闷，现在作品中的便是那主人公变态的性倾向。《沉沦》的“他”，是在这种苦闷中苦苦挣扎，是在这种充满情感的真实流露，使人有着一一种纯净的悲哀。这些当然与郁达夫本人的性格和气质有关。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孟昭·阿卡丹庚认为“我擅长写关于我身边的故事，而我不擅长写我不熟悉的”。在泰国文坛上，评论者曾评论孟昭·阿卡丹庚小说是他的自叙传，但他却不承认。他说“我的小说是凭我的构想而写的，是以真而写的，所以难免出现将我投入到小说中。我再说一次，我的小说不是我的自传。^[1]”虽然他不承认这个观点，但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小说中的观点，情节，人物，都是离不开作者本人的。

孟昭·阿卡丹庚与郁达夫都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笔者认为孟昭·阿卡丹庚像俄国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多余人日记》的一位家道败落，身世飘零，性情抑郁的贵族青年人形象。再说，郁达夫小说思想最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所以通过这段话笔者认为，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他们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深。加上他们本人的个性，气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说创作艺术。

总之，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现在都已是文学界公认的优秀作家。在两位作家生前所处的年代和国度，他们的作品一问世，便轰动了当时的中泰文坛。对爱情苦闷直率的表露，对人生苦难的表白，对小人物的零余者形象的描绘，无不使得当时本国文学界及社会各界反应极为强烈。他们开拓的“新文学”，对 20

^[1] 孟昭·阿卡丹庚. 黄种人白种人, 曼谷: double nine出版社, 1999. 13 页

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中泰两国作出很大的贡献。如今，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的思想进步与文艺批评的洗礼，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的作品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肯定和普遍接受。

对郁达夫的研究评论有着多种多样，但对孟昭·阿卡丹庚的研究评论相对比较少。所以通过本论文不仅能弥补对孟昭·阿卡丹庚本人和其作品研究的欠缺，而且能展开泰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此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尽管二者在许多地方都有极大的可比性，但一则由于泰国的比较文学批评起步较晚，泰外的比较研究从深度到广度都普遍欠缺；二则由于孟昭·阿卡丹庚在国外的影响比之郁达夫在国外的影响差之甚远。因而海外学者对孟昭·阿卡丹庚研究很少；三则在国内学者对孟昭·阿卡丹庚和郁达夫研究也是比较少，甚至将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放在一起比较的文章迟迟没有出现。

笔者为了填补两位作家个人的研究史和中泰比较文学史上的空白，进行了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小说创作特点异同的研究。因此，对中泰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两国文学较有影响力的文学巨匠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的比较研究，意义深远。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接受过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可在其中吸取他们的文学精髓，从而为展示文学的多样性，为进一步丰富世界文学研究宝库而贡献微薄之力。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郁达夫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一、郁达夫的社会背景

中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陷于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依靠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操纵了中国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强迫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签了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经济独立和国家自卫能力，将中国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这段期间，中国人民不堪忍受压迫和剥削，而起来反抗，终于这些点燃了中国人民反抗接连不断的革命运动。

到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推翻了清王朝 260 余年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先天的软弱。后来政权很快落到了反动派袁世凯手里，中国就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经过 70 年的反抗斗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下，都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落在了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肩上。

1919 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运动反对当时政府出卖国家的主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虽然曾以战胜国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向和会提出了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条件，要求废除日帝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要求收回在大战期间被日帝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遭到了拒绝，充分展示了帝国主义争夺和牺牲中国利益的狰狞面目。因此，激起了当时众多人民的极大愤怒，而且也激起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深深不满。身处异国的大多数留学生因此对祖国命运而忧虑，对祖国的危亡而痛苦，盼望祖国快快强大起来。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郁达夫正是出生在一个苦难的动乱时期，必然会给他带来了极大打击。不难看出这些能影响到他小说中的思想观念，会打上这样一个时代烙印。

二十年代初，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对郁达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中国人民各个行业对政府出卖国家而罢工、呼喊、斗争，展示人民力量的客观形势，促使郁达夫对下层的社会的平民了解更加深刻。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时代，也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觉醒的时代。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造成了社会黑暗的局面。人民的神经麻木衰弱的情况，人民的所作所为都被当时反动军阀政府，封建社会，旧道德所控制。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处在这样的社会产生了失望、无奈、痛苦、忧郁、惆怅等等的感情。当时的社会黑暗势力还非常大，十分顽固，使整个社会机体呈现出严重的病态，同时造成了人民心里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

郁达夫置身的时代是苦闷与抗争，破坏与重构的时代。郁达夫就从他处在的黑暗社会文化意识出发，反对封建传统，攻击旧道德，大胆地和当时的封建传统，旧道德社会做出挑战。另一方面，展示“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特殊心理状态，对当时中国封建传统，旧道德的不满而产生的消极苦闷在其作品中也能得到相当充分的反映。从这儿能看到现代中国前进的历史变革。

文学作品题材和人物的选择，往往受作家所处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的潜在制约。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有着相似的社会境遇和人生经历，在作品题材和人物的选择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20世纪上的中泰两国，恰好处在同一历史进程。与西方国家相比，它们同样的不具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样地面临着强大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具有广大的不觉悟的农民阶级，使中泰两国弥漫着沉重的悲愤。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出生于相近的年代，当时中泰两国都是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又与他们签了不平等的条约，加上腐败的政府以及黑暗的封建社会，使两个国家都陷入了很深的民众苦难。当时中泰两国的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思想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各自国家的“弱子国民”，他们都主张“科学”和“民主”等主义，追求个性解放，反对旧封建传统道德等呼喊。因此在中泰两国社会中，起了接连不断的反抗运动，如：中国的“五·四政治运动”，泰国的

“六·二十四政治运动”。一方面是唤起民众的觉醒，另一方面是唤起国家富强起来。在不同国度的郁达夫和孟昭·阿卡丹庚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又都生活在苦难的动乱时期，相似的苦难社会现实背景使两位作家偏重灰暗的主题。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必然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在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之中，还显出他们的相异性。到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推翻了清王朝 260 余年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先天的软弱。后来政权很快落到了反动派袁世凯手里，中国就未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将中国社会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而泰国在 1932 年 6 月 24 日联合军官举行“六·二十四运动”政变运动，七世王被迫接受君主立宪政体，结束了泰国的封建帝制。运动后给泰国带来的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将泰国封建传统旧社会转换成新社会的民主主义，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最可惜的是孟昭·阿卡丹庚人生短，没有亲自看到泰国的这次政变，但在他作品中就能看到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的存在。另外，泰国曼谷王朝没有像中国清王朝受到那样悲惨的命运，它只是失去了政权，所以曼谷王朝没有被军官推翻。这是因为泰国皇王朝和泰国人一直以来有了密切的关系，泰国皇王朝是泰国社会不能失去的部分，所以泰国曼谷王朝到现在依然存在。

二、郁达夫的生活背景

郁达夫 1896 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县的一个没落三代书香之家，取名文，字达夫，三兄弟中排行老三。在他出世时，郁达夫的父亲郁企会，刚将改行业，从事新的工作，所以家境渐渐败落。在年幼时，母亲乳汁不够，而且请不起乳母，导致郁达夫自出生以来因营养不足，而体弱多病。郁达夫生长在优美山水和自然环境中的富阳县，这样的生活环境孕育出不少历史闻名的古人物。郁达夫从小成长在这个优美环境中渐渐培养成具有文人的气质，甚至深深影响他日后的自创，作出许多风格独特的诗，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在他三岁时，父亲离开了人间，

使他家境更加贫困，幸好他母亲是一位非常坚强的女性，为了养家而出外去打工。他母亲一直都支持孩子们上学读书，郁达夫的两位兄弟也读书在外。因此，家里只有祖母与下女翠花。郁达夫是在这种孤独环境中度过他幼年时代。由此可见，中国当时的“饥饿”，“寂寞”，“孤独”，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他孤寂的童年是影响成长过程的主要原因，以致塑造成他敏感的个性。他五岁时，母亲请来一位老师教他开始学习。他八岁时，转进公立的春江书院，直到他十一岁该书院改成了富阳公立高等小学学习。五年私塾的教育使郁达夫有了深刻的国学的基础，而后进入公立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英文课程及其他科学的知识。他十四岁时考入杭州中学，但后来被学校开除，只得回家自学。这个时期是郁达夫开始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同时也能看到他日后的作品《沉沦》中的彷徨的势头。1913年十八岁的郁达夫跟着兄弟到日本留学，他在这个阶段提高自己的诗艺术，同时还开始接触大量的西方文学，世界小说品。使他接触更多不同世界的作品风格，作品的写作艺术技巧，取材内容方式。这些提高了他文学的能力和水平，更是影响到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直到1922年，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归国。1913年，郁达夫到了日本，那时他只十八岁，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产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完成了他的成人仪式，这是他心理和生理成长的关键阶段。直到1922年，郁达夫完成学业归国。郁达夫在日本留学十年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他个人性格的形成，男性身份的确立，与社会女性关系和态度的形成，回国后政治立场的确立等等。郁达夫所接触的日本应该是全面而广泛的。然而，从郁达夫留给世人的记录和叙事来看，他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便是一个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留学生或者是作者自己，或者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但这种关系似乎给作者自己的心灵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不仅成为他开始文学创作时的中心主题，而且致使他在后来有关日本的小说和自叙传中总是把日本女性，两性关系与种族关系，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男性个体的身份危机与民族的身份危机纠缠在一起。而他的创作也由于对情欲的大胆表现而受到批评，同时又由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而被肯定。1921年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发起组织了创造社，同年发表《沉沦》。1922年5月回国后，先后编辑出版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刊物。1923年，他写了《春风沉醉的晚上》描写劳动人民苦

难遭遇的小说。同时应聘到北京大学当统计学讲师，此后又应聘到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文科教授，并编辑《创造月刊》、《洪水》等刊物。大革命中，他因写了批评广东革命政府的《广州事情》而引起成仿吾的不满，导致他退出了创造社，并和郭沫若发生矛盾。但是以现在的辩证目光来看，他的认识是有一点见地的，他的思路是清醒的，大革命的失败也证明了他的冷静与清醒。大革命失败后，他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但是并没有死心对革命自由的启求和个性解放的渴望。1928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迷羊》期间还与鲁迅一起创办了翻译，创造的《奔跑》杂志，介绍了俄国的时代文学艺术。1930年，他与鲁迅等人同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在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1933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时，他隐居杭州，写了《迟桂花》小说，反映了作者一度产生的苦闷彷徨。1935年民族危机更为严重的时刻，郁达夫再次振作起来，重新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激流，发表了正面展示大革命时期斗争生活图景的中篇小说《出奔》，这是郁达夫的最后一遍小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抗日救国事业，他内心的爱国热情又被唤起，投入抗战的时代洪流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底，到新加坡去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当地日本宪兵部强迫他去当翻译者，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侨，并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罪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

郁达夫童年的精神创伤、饥饿、贫困、孤寂、性爱压抑都是他童年创伤的主要因素。关于饥饿：他说“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历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逼着我。^[1]”经济对穷人的压迫力是郁达夫从小就领教过的，对金钱的痛恨和对贫困的恐惧是郁达夫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母亲为了给他买一双皮鞋，向亲友借钱而受到商人的侮辱。他说：“娘，娘！您别去了！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2]皮鞋引来家庭一场风波，也让他感到穷的味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使郁达夫树立了同情穷人的人道精神特质，他深刻的记忆说：“自从这一次风波以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

^[1] 郁达夫. 悲剧的出生.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 页

^[2] 郁达夫. 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4 页

衣服用具，都不想用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这个时候而起的。当时虽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这一次的波折，有起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僻的性格，还是改不转来。^[1]”所以经过这次的事件，可说是带给郁达夫人生的醒悟，从此厌恶有钱人家，也激起奋发向上和立志求学的决心。下意识只限与贫苦的同学为对象朋友交往，乃至对社会的劳动者困苦生活，尤其是农民，都寄予无限的体恤与同情。再说，贫穷是郁达夫产生自卑心理的根源，这种自卑心理发展到成人，产生两种症状：一是克服自卑而带来的自傲，这是郁达夫对权势，商贾的态度。二是自卑沦为极点，自我消沉，成为卑己自牧。这种自卑心理的良种态势，潜存了感情型病态人格的因素。

关于孤寂：郁达夫自幼多病，十分羸弱。三岁父亲去世，母亲在外忙于工作很少照顾他。两位兄长们也是在外读书，因而孤寂的童年养成了他孤僻的性格，也是影响成长过程的主要原因。以致塑造成他敏感，胆小，精神衰弱，怪癖的个性。尽管郁达夫也多次想改变自己的孤僻，但心灵的孤独，精神衰弱，身体脆弱却长久地停住了，这样成了他悲剧人生观的心理基石。

关于性爱压抑：郁达夫从小就受到传统教育的深浸，加上长期人生存在的自卑感和孤僻，影响到他的性爱产生了压抑和羞耻。他说：“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又说：“我虽然胆量很小，性知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有出息的行为^[2]”。郁达夫这种性压抑到了成年时，就爆发成了病态。

他的习惯性创伤，郁达夫的病态人格同他的生活失调，毫无节制，婚姻不幸乃至人生观等习惯性创伤有很大关系，这里勿论需要重复前面的例证，值得强调的是，郁达夫这个人生战场的失败者，他把对生命的热爱，现实的幻想，全部转化成了诅咒人性，宣泄自身苦难了。这些，造成了他童年创伤的激化。

^[1] 郁达夫. 书塾与学堂.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5 页

^[2] 郁达夫. 水样的春愁.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8 页

从他的生活道路来看。他经常产生“自杀”，“死”，“悲哀”，“忧郁”，“惆怅”，“孤独”，“寂寞”，“沉沦”等不健康的情绪，加上生理上的胃病，肺病，都加深了郁达夫的这种病态。

贫困家境，孤独寂寞，体弱多病的体制以及生活上的种种挫败对郁达夫的个性产生影响的最终结果是忧郁。因而，他的创作带有感伤情调，颓废色彩比较浓厚。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中又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相似的性格气质：他们童年的不幸，缺乏正常的温爱，流落国外，终生漂泊，惨痛死亡；他们都多情敏感，不容于各自的社会，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在作品题材和人物的选择上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都以孤苦伶仃，软弱自卑，自我批评，憎恨自咎，一事无成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为中心题材，真实地揭露知识分子精神性格上的种种弱点。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有着相似的童年的不幸，缺乏了家庭正常的温爱，郁达夫父亲早死，母亲在外打工，而孟昭·阿卡丹庚受到父母亲的偏爱，所以这样经常与孤独，寂寞，憎恨有关系，加上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在流落国外期间，因“弱子国民”，“生活贫困”而受到西方国家人的歧视侮辱。他们的“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等概叹，逐渐地形成了他们的忧郁，感伤的气质，从他们作品中能体现到这些的。

在中泰两国作家有着相似的生活现实背景当中，还显示出他们的相异性。

郁达夫处于中国社会中的平民等级，他所遇到都是在中国社会中的平民，地下人民等级的生存。他幼时，因家里贫穷而亲身体会到许多他人生的苦难，而且他因自学而到外学习，遭到中国农民工作辛苦，所以他对他们的贫穷与无知的命运，对中国的农村早已濒于破产绝境，使他为他们伤心，苦闷。这些也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反映出相当充分。而孟昭·阿卡丹庚生活在泰国上层贵族社会的财富色彩，但他曾说过：“我是个穷公子”，“我是个上层的多余人”，“我是个非公子非平民”。这些体现了他虽然出生于上层贵族的公子，但是因为贫穷的原因使他受到上层贵族社会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遭受到异性的性爱的拒绝。最终，

使他内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感到苦闷，痛苦无比。这些也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反映出相当充分。

三、郁达夫的文化背景

郁达夫，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终其一生，受到过多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就作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目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忧患意识，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古代的一些隐患思想以及某些传统伦理道德标准等都对郁达夫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些影响在郁达夫的生活与创作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封建时代的旧有意识对其影响也是双重的。那些不得意的知识分子穷困潦倒而产生的消极苦闷态度，在郁达夫身上反映得相当充分。浓重的悲观主义精神，行为上的放荡不羁，无所作为的感伤，甚至以酒精与女色来自我麻醉，如此种种像毒药一样损伤着作者及笔下的主人公。与此同时，中国封建知识阶层所追求的“兼济天下”的积极入世精神也在顽强刺激着作者那颗敏感的心。郁达夫曾不断的自责道：“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现在还有些什么呢？”^[1] 读者不难从中找到作者人格分裂的历史渊源。

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面对艰难的时世，因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产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心理品质和精神状态。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最可宝贵的一种精神，也是驱动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内在动力。自幼就热爱古代诗文的郁达夫，继承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情怀，同他们一样怀着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在它的影响下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在奇变迭起的时代变动和现实处境中，郁达夫就为国家危亡而深感焦虑，伤时忧国。从日本回国后，更是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革命之中。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意识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于是提笔写作大量政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暴露中国大后方的黑暗，抨击国民党政府

^[1] 郁达夫. 雪夜.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42 页

中腐败投降的丑恶行径，歌颂积极日的英雄事迹，鼓舞全中国人民奋不顾身，浴血奋战，抵抗外侮，赶走日本侵略者。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首先提出“与天地合德”的理想。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合一思想表明了中国人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即天地都是“一气”所化，万物莫不相同。天人合一思想对郁达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亲近自然，二是描写自然。郁达夫喜欢亲近自然，

他说：“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和谐和作用。^[1]”郁达夫不仅亲近自然，陶醉于其中，还把亲身体验诉诸文学文字，在他的小说中大量描绘自然，用一支饱含深情的巨笔展示大自然的风采和神韵。郁达夫文学作品中情景交融的自然描绘随处可见，现在作家中很少有人能与他媲美。

名士风流在中国影响深远。魏晋时代的名士痛恨社会政治的黑暗，或者沉溺于醉酒，或者纵情于妇女，或者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出顺其自然，任性抒情之风气。名士风流对郁达夫的影响很大，他不仅推崇魏晋时代的名士，向往名士风流，甚至自称骸骨迷恋者。他说：“生在乱世，本来是不大快乐的。但是我每自伤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乱世，何以不生在晋的时候。我虽没有资格加入竹林七贤——他们是贤是愚，暂且不管，世人在这样地称呼他们，我也没有别的新名词来替代。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时候，至少也可听听阮籍的哭声。^[2]”可以说，郁达夫的骨子里有根深蒂固的名士气，这种名士气的来源就是魏晋名士风流。名士风流对郁达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批判现实，避世归隐和饮酒狎妓。

士人隐逸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隐士与“仕”相对，是指那些清高孤傲，洁身自爱的隐居者，也称为逸士，逸民，隐者等。隐士亦隐逸的方式逃避世俗，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隐逸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也深深地影响着郁达夫。古代隐逸思想对郁达夫的影响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逃避世俗，二是坚守个性。在日本读书时，郁

^[1]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1卷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83 页

^[2]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5卷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122 页

达夫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他失望地说：“弟来名古屋后，觉为人无趣味之可言，每有弃此红尘，逃归山谷，作一野人想。^[1]”当他回国经历了更多政治挫折和人生失意后，在回到故乡，面对大自然，他说：“啊啊，自然呀，大地呀，生生不息的万物呀，我错了，我不应该离开了你们，到那污独的人海中间去觅食去的。^[2]”

他宁愿隐逸在大自然中，决不再到污独的社会中，眼看那重重叠叠的黑暗，徒添郁闷。郁达夫时常反省自己的人生历程，为爱情，事业和人生的失败，空虚与无意义而悲伤，绝望。他访佛怯弱，无力斗争，只好借隐逸，不与丑恶同流合污来表示自己无言的反抗。隐逸思想对郁达夫的影响还表现在他有一种自觉地归隐倾向，以求坚持自己的个性。

在郁达夫看来，隐逸是天然浑朴的生命体验，是坚守自己个性的最好方式。他在创作中多次表达了这种思想，他写道：“乡下真可爱，尤其是在这种风和日暖的春天。桃季都剩空枝，转瞬是前夏的野景了，若能在这些附廓的乡间，安稳隐居半世，凯非美事？^[3]”

中国传统文化对郁达夫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塑造了郁达夫独特的人格和灵魂，让他表现出与同时代作家迥然不同的文化心理。

郁达夫一生所受到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还不同程度的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如果说，郁达夫对于传统文化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直接接触而受到熏陶的话，那么对于外国文化则主要是通过文学活动间接地受到了影响的。

郁达夫留学日本时正处于大正时期（1912——1926）。这是日本历史上比较特殊的时期。相对于明治和昭和时期，大正时期是一段和平，繁荣，自由和民主的时期。在文化界，大正时期也体现出了不同于明治时期的宽容与自由。西方一些社会文化思潮不再遭到一味的抵制和抗拒，而是经过接受——过滤——触合的过程，形成了大正时期自己的哲学思想或文化思潮。这种良好的氛围，使郁达夫得以安心地在文学世界中畅游。多年后，郁达夫在回忆日本的文化生活时说道：在日本有“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

[1]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9卷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316页

[2]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1卷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29页

[3]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9卷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285页

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拼命的只想去搜求些足使知识开展的食粮。^[1] “在高等学校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2]”。中国传统文化的性禁忌，使郁达夫自小产生了性压抑和性耻感，而西方现代文化的性解放又使郁达夫产生了性快感和性放纵。这种观念上的强烈对比，对于身处日本深受西化冲击的青年郁达夫来说，实在是难以把握尺度的。

那种性意识的失控是明显的，郁达夫也非常清楚这种西化的冲击，他说：“在这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伊索性的问题剧，爱伦堡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个灵魂洁白，生生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流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3]”从而在他的笔下性爱描写，性爱态人格刻画层出不穷。

外国文学哺育了郁达夫。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日本的“私小说”对郁达夫的影响尤其明显。卢梭所主张的“返回自然”，就是要返回人的自然本性，就是对“自我”的肯定。郁达夫称卢梭为“大自然的骄子^[4]”，赞扬他“称许本性的善处”，“比哪一个都要猛烈，比哪一个都能彻底”，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怎么也淹没不下去的影响。^[5]”

郁达夫 1913——1922 在日本的那几年，正是日本“私小说”风靡整个日本社会的时候。“私小说”也叫“自我小说”借用日本评论家就迷正雄的话来说，就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6]”“私小说”以“自我”为基础，对作家本人的私生活进行毫不隐蔽的暴露，尤其重视暴露私生活中的肉欲苦恼和官能刺激，描绘变态的性心理。这类“私小说”对郁达夫的影响很大。郁达夫肯定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序转’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强调“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7]”他认为每个现代青年，无

[1]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 4 卷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2. 157 页

[2]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 7 卷 [C], 五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A].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178 页

[3] 郁达夫. 雪夜, 郁达夫自述.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41 页

[4] 郁达夫. 卢梭传. 北新周刊第 2 卷, 第 6 期, 1928

[5] 郁达夫. 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 北新周刊第 2 卷, 第 6 期, 1928

[6] 转引吉田精一. 日本现代文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101 页

[7]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第 7 卷 [M], 五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A].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3

不具有“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郁达夫的这些看法，都能使人想到他与欧洲浪漫主义和日本“私小说”的关系。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在相似社会背景中拥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在翻开他们的作品中，发现虽然他们处在不同的国家，但从他们作品中拥有着相似的小说创作和思想观念。他们小说都是描写真实，来反映他们对当时的封建传统的黑社会和旧道德的不满。我们不难发现具有小说创作丰富色彩的他们都是他们留学期间受到西方文化，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他们曾经说他们最崇拜西方文学。因此他们回国后，开始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小说创作。

1913 年留日本的郁达夫和 1923 年留英国的孟昭·阿卡丹庚，他们都在国外受到西方文化思潮，文学思潮的极大影响。而且，西方文化思潮的自由，民族，启蒙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感伤主意等等在他们作品中反映得非常明显。这个时期处在这么好的宽松的精神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使他们得以安心地在世界文学中畅游，对培养他们的文学素养提供了极佳的土壤。相似的留外受到西方文化思潮使两位作家的创作方式的影响。

西方的思想文学强调的是“自我表现”，“个性解放”等等，这些正好符合两位作家的胃口。而作品注重于抒情描绘，心理矛盾的表白，露骨情态的描述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自暴自艾正和郁达夫，孟昭·阿卡丹庚的小说相似。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广泛接触了西方进步的思想文化，如：自由主义思想以及 19 世纪文化的结晶，现实主义中最坚实的作品，要求真实地描写。浪漫主义的主要思想倾向是要求作家内心抒情的描绘。但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感伤主义，无论是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俄国的感伤主义屠格涅夫的文风等都对他们这种审美观念，创作风格的形式有着莫大的影响。

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两位作家吸取了西方文化思潮的原因是跟他们本人个性，人生经历有关。这样打下了当时外国文化特色的烙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和泰国的现代小说创作。

中国是有着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郁达夫从小就受到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他曾说“母亲陆氏依照传统的习礼，请来一位老先生替郁达夫开笔。在孔子神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并念了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如

此，郁达夫完成敬孔之礼，可以开始上学。在他九岁时，他会写了一首古典诗歌，他母亲就以传统的见解，认识他太早突出才气，日后定不能成大器，甚至年寿也不长。这样不难看出郁达夫也是从他母亲的观念上受到传统观念。而泰国是有着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泰国以佛教为国教，宪法中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孟昭·阿卡丹庚出生于上层贵族，所以他各个方面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再说，一般泰国孩子都是跟着父母信仰的，所以从孟昭·阿卡丹庚作品中反映出相当充分有关佛教的，如：“世界上的不平等是人类生活规律中的一部分^[1]”，“我幼时对佛教的信仰比别的孩子还深，经常到庙去听僧人说教。^[2]”

儒家学派的孔子主张追求财富的欲望，讲究人的礼，德，道，仁的思想学。而佛教主张的是真理，所谓的真理就是对人的“能动存在状态”的认识。郁达夫与孟昭·阿卡丹庚处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产生他们的不同个性，气质，思想观念。这儿体现在他们作品中具有着各不相同的人物的思想观念。

第二节、孟昭·阿卡丹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一、孟昭·阿卡丹庚的社会背景

泰国有着悠久的佛统文化传统。可以说泰国人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响。泰国社会进入近代史阶段以后，随着外国的资本主义和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为了便于夺取原料和商品市场，他们把亚洲这块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这样首先暴露的是国家危机，因而萌生了启蒙思潮。

1824年，英国人以对泰国邻居缅甸发动了第一次殖民战争。为了诱使泰国落入圈套，英国人许诺把缅甸的某些领土“让给”泰国，以换取它在泰国的“贸易自由权”。第一次英缅战争以缅甸割地赔款而告终。英国人的“敲山震虎”不能不引起泰国王室的极大惊慌。1826年，在武力威胁下，泰国政府不得不与英国外交官伯尼大尉签定条约，这就是俗称的《伯尼条约》。虽然泰国政府在条约中还

^[1]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13 页

^[2]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19 页

有保留，不同意将鸦片输入泰国，皇家垄断的大米等商品英国商人一时还无法染指。但事实上泰国的大门已被打开，英国商人的“贸易自由”权已经到手。1855年，因为当时泰国不是英国的对手，泰国政府不得不与在驻香港总督鲍林的逼迫签定了《英暹条约》，俗称《鲍林条约》，使泰国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独立和主权，但能保持泰国的主权。英国控制了泰国的国防和贸易，又享有治外法权。直到泰国四世王时期，四世王是一位学识渊博，眼界开阔的人，又懂英文，选择维新国家。四世王主张仿效欧洲，向西方开放，对政治，经济和军事都进行了改革。五世王时期，他主张接受西方教育，改革开放，领泰国走向文明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如：抑制封建割据、整顿财政、兴办教育、改革法律、废除奴隶制度等等，加速了泰国实现近代化国家的进程。

东方各国的近代化是以殖民地化作为代价的，泰国也不例外。和西方不同，泰国的近代化不是国家的经济和自然的自然发展，而是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西方世界需要泰国扮演的不是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而是被剥削被榨取的对象，是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所以泰国建立起来的工业也不过是原料初级加工工业，而原料和制成品之间又是不等价交换的。

另外，主权的丧失，殖民者治外法权的获取，又使殖民者变成了主子，泰国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对东方各国说来，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初，泰国已经成了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移民地的国家。到了1910年，六世王时期，留西方国家的泰国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受到西方的文化和教育，萌芽了启蒙思潮，到了6.24政变运动前后，启蒙主义思潮出现了高潮。

由于对当时封建传统文化，国家的政体的不满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下军官秘密组织的“党团”进行起义。虽然最后失败，却以表明君主专制的统治已呈危象。到了1920年时期，受到西方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要求改变现状，不满封建思想的束缚。渴望民主，平等，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是他们思想上的一个共同点，而其中的激进者又表现为政治上的觉醒，否定王权，反对贵族，站到了时代的前列。这是泰国社会近代化进程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作家孟昭·阿卡丹庚，正是出生在这个苦难的动乱时期，他的思想和作品，必然会打上这样一个时代烙印。

1920 年以后，泰国经济逐年恶化，国库入不敷出。1929 年以后又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影响，危机加深，物价上涨，民不聊生。七世王虽大力裁减官吏，紧缩开支，但已无力回天。直到 1932 年 6 月 24 日联合军官举行政变，七世王被迫接受君主立宪政体。皇权衰落，贵族地位下降，是这次革命的直接结果。但由于泰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很不彻底，它很快与封建势力妥协，人民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际利益，所以也难于得到人民的支持。封建势力企图复辟，新贵们的内部争权夺利，泰国国内的局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于动荡不定之中。

孟昭·阿卡丹庚置身的时代是苦闷与改革，破坏和重构的时代。孟昭·阿卡丹庚从当时的社会文化出发，一方面是攻击封建传统旧式道德，表现出大胆暴露的思想改革的同时，又把新旧价值冲突形成的矛盾真实地写出来。另一方面是展示“6.24 政变”时期受到西方文化和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心理状态，旧有意识的深远影响，封建时代的不得意，不平等的社会的知识分子穷困潦倒而产生的消极苦闷在其作品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反映。这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现代泰国前进的历史革。

二、孟昭·阿卡丹庚的生活背景

1905 年 11 月 12 日，孟昭·阿卡丹庚亲王出生于泰国曼谷，是家中六男七女中的皇族的大家庭。父亲功么黄拉查普里帝雷利（กรมหลวงราชบุรีดิเฑณฑิ์）是当地有名的皇族的一个法家，也是一位“泰国的法政之父”。他的母亲模昂（หม่อมอ่อน）只是当地的普通平民。由于他家中有着很多兄弟姐妹，再加上他个性的不善于交际，胸怀不开朗，孟昭·阿卡丹庚从小就在父母的偏爱中成长，因而养成了他的忧郁人生，无价值地存在的思想观念。他小说中提到：“天啊！哦！虽我还小，但苦命，无数的痛苦，使我忍不住地笑出我的命运为什么经常受到这样的悲

惨。^[1]”这种缺乏父母的温爱养成的他忧郁苦闷的人生在日后他的作品中可见端倪。

随着时间的推移，孟昭·阿卡丹庚一天天地长大。由于他自幼聪颖好学，中学时期就对文学饶有兴趣。十八岁的他就开始把法国文学作品《阿尼瓦·松扩》翻译成泰文。1924年，他带一些钱到英国去留学，决定学法律。孟昭·阿卡丹庚在英国留学的同时，又有机会走上传媒界和文坛。这些时间，他受到许多西方文化和教育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而且获得更多的知识，打开眼界和视野。不仅如此，他身世受到的歧视和侮辱，甚至他肤色的鄙视。这样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苦闷的人生，再加上性格压抑，形成了他人生的苦闷，性爱的苦闷，最后只28岁的孟昭·阿卡丹庚就选择自杀这条路。

1929年，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人生戏剧》，开始了他的文学道路。《人生戏剧》是第一篇以国外为背景，描写一个泰国留学生在英美的经历，他所受到的苦闷和欢乐，一个置身于西方社会的东方青年的感受和见闻。《人生戏剧》出版后，轰动了泰国当时文坛上，受到当时读者的欢迎。

一直追求异性真爱的孟昭·阿卡丹庚，但等他的却是失望，歧视。这样不断地受到打击，使他沉沦于无价值存在的小人物。所以从他的作品中来看，能体现到它是以他的人生苦难和情感苦闷而诞生，更不难看出从他作品中能找到他本身的影子。

1928年，孟昭·阿卡丹庚回国时期。虽他没有得到文凭，但他在国外所经历过，所见所闻，使他感到无所谓的心情。

孟昭·阿卡丹庚以《人生戏剧》闻名于世，但事实上，他心目中一直所追求的爱情依然没有变。他无法解脱这样的心情苦闷，投入到黑社会去赌博。最后，这些缠绕在他身上，无法脱离。1932年，自杀是孟昭·阿卡丹庚选择这条路，结束了泰国亲王，著名作家的一生。

[1] 孟昭·阿卡丹庚. 人生戏剧, 曼谷: 帕匹大亚出版社, 2001. 19 页

三、孟昭·阿卡丹庚的文化背景

孟昭·阿卡丹庚这位泰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作家，他的文学成长过程也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影响。

首先来看封建传统文化对孟昭·阿卡丹庚创作的影响。纵观他的代表作品《人生戏剧》，他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大胆的描写剖析一夫一妻的家庭，企图解放以男性为主的思想观念，主张男女平等，提倡两性的互相尊敬的善好的伦理。不仅如此，他大胆地揭露泰国当时上族贵层的腐朽黑暗，企图摆脱手里没钱，心里怨恨的贵族的束缚，提倡人的好坏在于教育和培养，不是以是否出生于贵族来衡量。孟昭·阿卡丹庚想通过其作品给当时的泰国人以启蒙，破除封建传统思想。从孟昭·阿卡丹庚用《人生戏剧》作为小说的书名来看，作者“把生活比喻为一出戏剧，戏剧有正面人物，有反面人物，有高潮，有低潮，有插曲，有倒叙。戏剧是人的，生活是无常的^[1]”。不仅如此，他主张的是一夫一妻，回报恩人，忠实等等，所以翻阅他作品，发现多多少少佛教的教义的存在。这无疑是作者创作的思想与佛教的教义有关系的。佛教在泰国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几百年来，佛教对泰国人的各个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而可见佛教对他的人生观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再通过以孟昭·阿卡丹庚作品创作的性爱主题来观察男女角色，从中发现男女共同的反传统行为，但还发现矛盾的女性角色的两性表现，这些是东西的女性思想的差别，也是泰国封建传统佛教社会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差别。

孟昭·阿卡丹庚作品忧郁感伤风格的形成。据说，他自身的忧郁自卑的气质因素外，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思潮，欧洲的“世纪儿”的形象等对他这种审美观念，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

感伤主义文学初兴于 18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后蔓延至欧洲诸国，它不仅批评贵族，也批评资产阶级，崇尚感情向上，提倡细致刻画人的内心活动。主张描写自然风景，强调个性和个人精神生活。常以生死，黑夜，孤独为题材，多用第

^[1] 栾文华.《泰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222 页

一人称的手法，采用自白、日记、游记、书信、回忆录等形式，呈现出强烈的主观化和情绪性特征，作品语调悲哀，语言灰暗。

1924年到1928年是孟昭·阿卡丹庚在英国留学期间。19岁到23岁对一个人来说是人生观确立的重要时期。他在英国留学时期，西方文学对孟昭·阿卡丹庚的文学创作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英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斯泰恩，他作品的《感伤的旅行》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描写了主人公约里克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小说的目的不是要描绘沿途风景，风俗人情，而是抒发人物被所看到的事物所激发起来的感覺和情感。斯泰恩的小说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它没有一个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故事情节，他的小说都是由一些彼此独立，互不关联的故事连缀而成。孟昭·阿卡丹庚就对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创作中，翻开他的作品，无疑是孟昭·阿卡丹庚“自传”通过游记的创作形式和“世界儿”的形象流露出感伤主义文学的色彩，这些创作是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受到影响的可能。孟昭·阿卡丹庚就以他第一部《人生戏剧》开拓泰国新文学，他作品的与众不同的情节、人物形象、故事背景等用第一人称，悲剧的结局不是翻译本，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了新鲜的味道，很快就被众多读者的欢迎。

西巫拉帕说：“孟昭·阿卡丹庚的所有作品都是给泰国文坛上带来了悲伤新鲜的文学意味^[1]。”

据说，感伤主义对孟昭·阿卡丹庚有着极大的影响，虽然他没有说他是感伤主义，但翻阅他的作品，反映他自己周边的故事的作品也占一定的比例。这说明西方文学的感伤主义多多少少对他的创作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建立了自己多元的文学创作风格。

^[1] 孟昭·阿卡丹庚的世界. 理坚卡辛. 曼谷：顿欧出版社，1997. 1页